愛滋、同性戀與婚家想像

《紙婚》的「殘／酷」政治

蔡孟哲（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本文討論《紙婚》（陳若曦，1986），回望愛滋在1980年代蔓延的種種影響，試圖分析小說如何再現所謂「幸福婚家」和「不幸疾病」之間的辯證。透過探問愛滋病和同性戀對於敘事的作用與效果，本文認為小說展現出一種「殘（障）／酷（兒）」的政治性，可以用來質疑以婚家慾望為基礎的「同志幸福政治」。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殘／酷議題（特別是愛滋情節）被嵌入小說敘事中，對於小說敘事產生什麼作用？亦即，關於殘／酷的想像如何推動敘事情節的展開？而小說中的殘／酷又如何能連結到小說所處的社會脈絡？本文採用「描述性閱讀」的觀點來分析《紙婚》，將小說視為「紀實美學」的展現，藉由這樣的閱讀徑路，凸顯《紙婚》所描繪的污名現實，推展本文所要呈現的殘／酷政治。本文強調小說觀察並描述美國社會如何面對同性戀和愛滋，透過小說技藝和文學手法再現那段歷史，看見1981年愛滋出現後，體現於全球男同性戀身體的「殘／酷」政治，回望有關疾病、殘障、污名、歧視、死亡、失落的歷史。

關鍵詞：愛滋、同性戀、身心障礙（殘障）、酷兒、陳若曦、描述性閱讀

一、前言

陳若曦，本名陳秀美，1938年生於台北永和，代表作為短篇小說集《尹縣長》(1976)。本文將重返她八〇年代的長篇小說《紙婚》，藉由小說敘事，回望愛滋在1980年代從爆發到蔓延所造成的種種影響，試圖分析小說如何再現所謂「幸福婚家」和「不幸疾病」之間的辯證；透過探問愛滋病和同性戀對於小說敘事的作用與效果，本文認為《紙婚》展現出一種「殘(障)／酷(兒)」的政治性，¹ 質疑以婚家慾望為基礎的「同志幸福政治」。以本文的研究關切而言，若僅就女主角的口吻來看小說裡的「殘／酷」議題，故事在當前讀來是保守退步且政治不正確、甚至缺乏政治性的；但在飽受爭議的議題上，小說敘事卻同時讓各個角色發聲、辯論和對話，雖說不上眾聲喧嘩，卻能讓讀者感受觀點位置的並陳，以及立場態度的矛盾複雜。

《紙婚》的敘事鋪陳像是歷經一場場社會文化智識思辨，也呈現了八〇年代末冷戰時期、「台一中一美」政治局勢的複雜性。例如描

致謝辭：本文初稿發表於2013年10月17日台大婦女研究室舉辦的「性別與台灣文學」專題工作坊，感謝黃宗儀、陳妙芬、陳昭如、黃長玲、洪貞玲和陳佩甄當日的提問與建議，以及紀大偉在工作坊舉辦前的組織和討論。對於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以及劉人鵬、宋玉雯、陳奕村、黃道明和喀飛在寫作和修改過程所提供的深刻意見，在此特別致謝。

- 1 本文以「(身體的)邊緣／罔兩(的位置)」來定義「殘／酷」政治，此政治性定義在台灣有其在地歷史的意義轉化過程：在一連串同志及相關社會運動的抗爭歷程中，經過學院知識分子的轉譯和辯論，以及社會運動者接合挪用並重新賦予意義，「同志」和「酷兒」皆已有別於1990年代被引介到台灣時的樣貌，這也和晚近美國對於酷兒理論的反省有地理政治學上的差異（詳細討論見Liu, 2007；卡維波，2011）。酷兒除了介入各種邊緣主體的社會運動之外，學院內部目前也嘗試接合殘障研究的觀點，如McRuer（2006）、劉人鵬編（2011）。

述當時美國社會及華人移民社群的不同婚姻狀態，呈現各種婚姻態度，甚至角色對婚姻制度的操用。² 又如敘事採用偏自由主義的人道觀點，記錄當時愛滋在美國爆發擴散的情況，再現公共及個人層次的愛滋歧視與恐懼，也詳述美、法兩國愛滋醫療的競爭進展和愛滋人權運動的倡議。再如故事從主角尤怡平（即「平平」）的局外人視角描繪舊金山的同性戀社群，更深入探討社群內部的爭論，像是單偶守貞或開放關係多伴侶。敘事在想像或緬懷美國六〇年代解放運動的同時，也藉由其他角色的對比口吻提出質疑和批評，並連結平平對文化大革命的種種不滿及創傷。

此外，本文以「殘／酷」為閱讀策略，回應歷來對於《紙婚》的文學評論（或對於陳若曦小說的研究）。文學研究乃依其各自的觀點和理論根據進行批評與分析，後設來看，這也反映出評論者閱讀和批評的目的；因此，小說情節在不同時空脈絡的文學評論裡被迥異看待，在書寫的政治之外，還有文學評論的政治。本文將採用美國酷兒學者 Heather Love 的「描述性閱讀」（Love, 2010, 2013）來分析《紙婚》，將小說視為「紀實美學」的展現，著重於敘事如何觀察並記錄美國社會看待同性戀和愛滋的污名歷史，藉以理解殘／酷所面臨的社會處境，及其蘊含的歷史和政治意義。

歷來研究陳若曦小說的評論者，提出了各種看法：或認為《紙婚》充滿白描技法，是寫實主義小說；或強調女性自主能動，因而列為婚戀小說；或關注政治意識，將海外華人移民解讀為美中台關係；

2 例如來自中國的主角尤怡平和前男友下鄉時，因害怕在新疆永久落戶而不敢結婚，又如她和美國白人男同志項假結婚，好友上官離婚後又盤算和老美結婚，台灣人汪奇的拒婚主義，老倪和榮芳的留學生待產婚姻，郭誠的父母鬧離婚等。小說對婚家的討論詳後。

或將同性戀和愛滋解讀為人道主義或西方主義的象徵隱喻。若以人文主義詮釋學的深入細讀來看，《紙婚》在不同時代背景的文學批評與再現政治下，都顯得不合時宜；它所描繪的中國移民女性形象、白種中產男女同志樣貌，以及愛滋爆發的社會脈絡，需費心詮釋才能挖掘出文本的涵義，從而召喚出反共的、女性主義的、同志酷兒等批評模式，也生產出相關的評論意義。本文認為《紙婚》恰恰實寫了做為「殘／酷」的愛滋與同性戀——包括它們在當下的歷史時刻所歷經的社會與政治挑戰，以及它們必須直接面對的、現在看來仍顯保守、負面、退步、污名、政治不正確的修辭和觀點——而沒有隱藏、壓抑、消音、無視，或以道德進步來修補美化。

無論在《紙婚》所再現的歷史時刻，或在其出版的「後八〇年代」時空脈絡，台灣及全世界都處在愛滋疫情高度警戒及愛滋污名強大衝擊的狀態。³ 在社會文化轉變的過程裡，男同性戀社群因其身分與愛滋連結的污名而受到種種歧視。⁴ 愛滋接合男同性戀在台灣有其在地歷史脈絡與性／別政治意涵，特別是在冷戰年代，國家公權力藉法律條文與社會輿論懲禁性工作及性變態，打造出性的管制秩序，其施展於「男同性戀—賣淫—愛滋」三位一體的規訓力道，生產出「懼色恐同」的愛滋論述，將愛滋給「同性變化」（黃道明，2012: 96）。⁵ 就本文所探討的台灣文學領域而言，紀大偉（2012a: 114）在

3 1986年2月，台灣出現首名本土愛滋帶原者後，HIV感染人數即在短時間內激增：根據1985年5月到1990年1月的台灣官方統計數字，不到五年就有134例證實感染（行政院衛生署防疫處，1990），至2010年12月止，共有22,822例HIV感染者及1,086例愛滋發病者（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12: 133）。

4 參見張平宜（1995）、廖娟秀（2000/1995）、汪其楯（2010/1995）。

5 特別參照第二章〈賣淫、變態與愛滋：「玻璃圈」的秘密〉的在地歷史分析。

《台灣同志文學簡史》中，將 1984 年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標識為「最早提及 AIDS 的台灣文學」；他強調閱讀《玫》時要脈絡化及歷史化，注意其寫作年份早於台灣本土愛滋個案，小說雖因時代氛圍把男同性戀與愛滋劃上等號，而且算不太上同志文學，但「大致上卻是文學描寫男同性戀的里程碑」（紀大偉，2012a: 115）。朱偉誠（2005: 19）的研究則將《紙婚》放在台灣愛滋文學開創者的位置：

透過一個中國大陸女性移民略帶負面的觀點，來寫美國西岸的同志文化與愛滋病開始肆虐的景況，算是開啟了台灣愛滋文學的先河，儘管所描述的對象並非台灣。

若以年代時序來看，陳若曦的長篇小說《紙婚》是台灣文學裡最早以男同性戀愛滋感染者為主要書寫對象的同志文學，即便它再現的時空場景並非台灣，但敘事仍然詳盡記錄愛滋與同性戀當時面對的污名及壓迫。對於《紙婚》的愛滋議題，歷來研究並無太多著墨，本文著力分析「愛滋」產生的效應，企圖延續並深化朱偉誠的評論。

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殘／酷議題（特別是愛滋情節）被嵌入小說敘事，對後者產生什麼作用？亦即，關於殘／酷的想像如何推動敘事情節的展開？小說中的殘／酷又如何能連結到小說所處的社會脈絡？本文的分析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殘／酷為視角，先進行小說的細讀（close reading），並討論歷來文學評論；此部分嘗試展示人文主義文學批評方法論的詮釋徑路，探索殘／酷對於敘事的作用和影響，分析它們在故事裡代表的隱喻象徵，以挖掘文本層疊且深厚的意義內容，這樣的詮釋實踐是文學研究裡重要的關懷傳統。第二部分討論 Heather Love 結合細讀和淺描（thin description）的描述性閱讀法，

她認為過往的文學詮釋傳統輕視觀察和描述的技術，文學研究若能引入社會科學技術，擴展分析和閱讀的定義，將能使文本回到社會整體互動、對話與溝通的脈絡，呈顯出連結文本與社會世界的複雜狀態，展現 Bruno Latour (2005: 117, as cited in Love, 2013: 402) 所說「真實的社會到底是什麼模樣」；本文藉由這樣的閱讀徑路，來凸顯《紙婚》描繪的污名現實，推展本文所要呈現的殘／酷政治。

二、成就婚家想像的殘／酷

《紙婚》並非陳若曦最受關注與評論的作品。她最著名的創作是 1976 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尹縣長》（後來被翻譯成十幾國的語言出版流傳），取材自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苦難，呈現她對於文革及中國的觀察、批評和反省。陳芳明（2011: 690）將她定位為「可能是第一位寫出『傷痕文學』的作家」。1980 年代後，陳若曦不談文革而轉向書寫海外華人的生活和思想，從短篇小說〈路口〉開始，後有《突圍》（1983）、《遠見》（1984）、《二胡》（1986）和《紙婚》（1986）等系列。相較於其他作品（包括早期的〈收魂〉）流傳世界各地，《紙婚》「沒有任何翻譯，而其名聲被《尹縣長》系列中的反共故事所掩蓋」（Liu, 2010: 293）。有論者將她這時期的作品歸類為「婚戀小說」，分析作者從女性立場反思性別角色對婚姻家庭的態度，凸顯小說中的女性意識與自主性（吳達芸，1988；林宋瑜，2000）。Petrus Liu 重新標定《紙婚》為「跨國酷兒政略」（transnational queer politics）的開端，以一種讓我們能遠離異性戀正典的模式來批判民族國家；小說所描繪的酷兒生存，鑲嵌於台海兩岸與美國之間的政治情勢、文化衝突和經濟不平等，藉由討論這點，Liu 推進思考酷兒理論與地理政治學

彼此關聯的重要性 (Liu, 2010: 292)。(詳見第三節討論)

《紙婚》的時空背景是 1985 年的美國舊金山，敘事以第一人稱日記體形式，記述非法打工的中國女子尤怡平被移民局查獲，因緣際會和美國白人男同性戀項·墨非假結婚，以便居留美國；項另有同志伴侶修，項被修傳染愛滋且發病，平平拿到綠卡後仍照顧他到臨終。在故事的設定中，平平擁有三層「家庭」：她在中國大陸的「原生家庭」於文革期間被抄家，她受到批鬥，上山下鄉，母親已亡故，父親和兄弟留在上海，但這個家早已人滿為患，沒有她的位置。她到美國後的「親屬家庭」則由血緣連帶與華人關係網絡構成，寄人籬下住在姑媽與表姊夫婦的家中。她為躲避移民局遣返而與項假結婚，則製造出「另類酷兒家庭」(非法移民+跨國界跨種族+跨性/別)，讓她能繼續留在美國，也進入舊金山的同志社群及愛滋場域；通過紙婚，似乎讓平平與親屬家庭的關係得以存續，但這群親友後來也因她照顧愛滋病患而逐漸疏遠她。

本文認為在敘事推展的過程裡，「不幸」愛滋成就了某種「幸福」酷兒婚家，維穩了這場契約婚姻，同時也削弱親屬家庭的連帶。小說前半部像是背景鋪陳，細述平平生活周遭的華人角色與互動，以及她與項假結婚後展開的紙婚生活，包括對項的同性戀朋友與社群的觀察。愛滋在《紙婚》的中場逐漸現身，後半部開始充滿照顧愛滋病患的日常經驗與細節，它填補了在前半部啟動、驅動敘事，但實際上空洞的紙婚。以下引文分別摘自小說前半與後半，前一則是平平在婚後描述獨守空閨的心情，後一則是項第一次發病出院後回家，平平聽到他說很高興回家，口氣中滿含知足與甜蜜：

結婚竟是一件寂寞的事。

這是他的家，他卻不回來。是恆常如此，抑或今夜例外？（陳若曦，1986: 6）

真高興他回來。家的氣氛，恬靜寧馨，又降臨了這兩間房的小屋。

第一次能全面照顧他，甚至左右他的舉止，不禁令人暗自慶幸，簡直自豪。（陳若曦，1986: 193）

愛滋對於敘事的作用，讓原本只是要符合國家法律條件的假結婚，同時產生了內容與形式上的雙重效果。在內容層次上，項感染發病後，平平「半自願地」接手照料他的病榻生活，相較小說前半描述的日常相處，兩人孕育出更多生活互動與情感交流。平平取得綠卡後沒有離婚而留下照顧項，一方面是她對項有戀慕愛意（但更多是回報項之前對她雪中送炭的人情道義），另一方面也是她其實無處可去的現實困境，即便她已經從非法移工變成美國公民。

上述引文中，平平感受到項對於這個「家」的滿足。她認為即便這只是場紙婚，自己也付出了許多心力。然而，她的主觀感受，其實是敘事承載了一般社會對於幸福婚家想像的客觀再現，包括認為伴侶家屬能夠親力親為、擔負醫療照顧責任的美好期待，這似乎是常規社會認定「家」真正該有的實質意義。當平平成為「家屬」、成為有義務卻無償的愛滋照顧者時，這個「家」才獲得她們（及讀者）的認可。至於前半部描述她成為「女主人」進駐後的種種作為，例如在家屋物理空間上的整修維護、與鄰居親友的送往迎來、實為租賃卻

又如友伴關係的同居共食生活等，⁶ 都顯得不重要，都沒有讓家成為「家」，而是在愛滋進入敘事、平平著手照護項的病體和生活大小事之後，才讓原本寂寞的夜、空蕩的家，裝填了社會所認定的婚家氛圍與特質。只是，這個「家」的另一面也是一副沉重的枷鎖：當上官建議平平將屋子整棟出租另覓住處時，平平告訴上官不可能，因為她已「答應為病人理家和償債，代他上班以維持醫藥保險，並支付各種費用和稅項」（陳若曦，1986: 335），上官認為她瘋了才給自己套上這些枷鎖，若項老不死，她終無自由之日；平平覺得上官的話像利牙般咬破她的耳喉，因為她雖覺得上官自私，自己卻也曾希望項能長睡不醒，早點死去。愛滋補足了原本僅止（只）於形式的婚家，讓項成為身體受折磨的病人，讓平平變成一肩扛起責任的家庭照顧者；愛滋在她倆身上「體現」了「家」的實質意涵。

在婚姻及法律層面，平平因假結婚而順理成章地成為項生病失能時的法定代理人，於是在項出現血便症狀、第一次急診入院時，能以眷屬身分辦入院手續。當時對於愛滋的臨床醫學研究尚未全面展開，許多病理知識仍在累積，這也是小說為何能有這段配偶（即便是「假結婚」）行使緊急醫療權的情節，因為醫生還不能確診，項必須留院觀察病情，進行抽血和追蹤檢查（陳若曦，1986: 173-174）。項被診斷出愛滋病後，小說進入後半部，隨著敘事進展，項的身體也逐漸衰竭，他先是將藝品店的店務全權委由平平處理，囑託殯儀館的安排和

6 小說共 373 頁，前 170 頁描繪平平與項婚後的許多同居生活細節，像是平平整整後院花木草坪，油漆粉刷陽臺，負責買菜煮飯，和鄰居唐納一家互動，接待項的同性戀親友、母親和受家暴的前妻；平平雖付房租給項，但她認為項是很好的朋友，總是做得更多，所以上官才會取笑她不就是房東與房客的關係，何以變成一個婆媽般的家庭主婦。反之，項則教平平開車，或許基於愛才惜才的心態，他也鼓勵平平從事藝術創作，並幫忙仲介推銷她的作品。

不要葬禮等後事，到最後只能住在醫院維持生命時，除了交代她臨終放棄急救之外，也找來律師，要平平代替他處理財產：

卡律師遞給我一份授權書，項已在上面簽了名。

「你願意代替墨非先生料理財產，包括債務，並簽署所有文件嗎？」

他莊重平穩的語氣，像透了給我證婚的奧康諾牧師。

病人對著我微笑：「我信任你，平平。」

「我願意！」

為了彌補婚禮上的遲疑和膽怯，這次我大聲地回答律師。清脆的嗓音劃破了病房密閉似的沉寂，也在自己的耳膜上激起震盪。

（陳若曦，1986: 300）

故事甫開場就是這原本有特定目的、徒具形式而演出的紙上婚姻，平平在日記裡記敘自己回答證詞時，因過度緊張聲音太小而讓牧師停頓，但在照顧愛滋「丈夫」的過程中，她逐漸獲得項的情感和信任，也洗去自己對這場形式婚姻的遲疑和膽怯；也是因為婚姻形式帶來的法律效力，她不僅獲得綠卡，也獲得對方的財產。故事結束在日記追加的簡短〈附記〉，描述項死後律師拿出遺囑告知平平，項留下遺產給她：「我謹把房子、汽車、現金和債務遺留給我摯愛的妻子怡平·尤·墨非，其他如書籍、唱片、攝影有關的一切全留給我摯愛的朋友朱連·高德」（陳若曦，1986: 372）。當平平試圖向律師解釋她和項是方便婚姻時，律師強調「他只回答法律問題，而遺囑完全合法」。最後，連惟一能說明內情的好友朱連，也開煤氣自殺，跟隨項一同死去（陳若曦，1986: 373）。伴侶與好友生命的終結，是日記的完結，

也是敘事的完結；這看似唐突的收尾，凸顯了形式大於內容的效果。若從整體敘事的層面來看，Liu（2010: 308-310）也精彩地剖析：《紙婚》的敘事結構其實是對婚姻誓詞的諷刺，平平在取得綠卡後原可離婚，卻選擇照顧愛滋病發的項直到他死去，相較於故事中其他失敗的婚姻，如倪信正和榮芳的爭吵、表姊和表姊夫的疏離、上官的離異、項曾經離婚、項的母親結婚三次、琴的家暴等，她才展現了西方婚禮誓詞裡「至死不渝」的字面意義，也讓這場經濟盤算的謊言紙婚，成為這本書唯一真正的「婚姻」。

本節嘗試以愛滋為焦點來分析《紙婚》裡的婚家想像：愛滋同時做為開展及推動敘事的主要驅力，這個敘事過程也讓平平逐步邁向法定未亡人／配偶的位置——她既繼承遺產，也獲得情義肯認；既承擔起照顧責任，也背負了情感失落。換句話說，是愛滋（及其帶來的死亡）讓這場形式婚姻有了實質內容，讓平平在組成酷兒另類家庭的偶然經歷裡，同時獲得女性生命的自主與成長，但敘事要我們代償的卻是男同性戀與愛滋病患的死。平平看似幸福，穿越一段婚家的立與破的歷程，她似乎什麼都有了，也什麼都得到了；但同時，愛滋也摧毀了平平的家庭與世界，她的摯愛（項）與摯友（朱連）都已死去，她承受愛滋帶來的無比哀慟與失落：「人死了，一切不可能照常。我甚至寫不下日記。且讓這本日記與他共休吧」（陳若曦，1986: 372）。「一位可親可敬的朋友，我謹以休筆來表示哀悼」（陳若曦，1986: 373）。

三、做為敘事義肢的殘／酷

關於愛滋推動敘事進展的觀點，本文採用 David Mitchell 和

Sharon Snyder (2001: 224) 提出的概念——殘障（身心障礙）做為「敘事的義肢（輔具）」（narrative prosthesis）——嘗試說明愛滋（做為一種殘障）就是《紙婚》裡「敘事的義肢」：它像一枝拐杖，成為敘事的輔助裝置，敘事仰賴它而持續進行。就如 Michael Davidson (2006: 136-137) 所分析的，「敘事的義肢」是一種殘障詮釋學：殘障角色提供了一種身體完整性的錯覺，而小說在形式上對於整全性（totality）的宣稱，便建立在這錯覺之上，於是生理缺異被敘事隱喻為倫理或道德的敗壞，故事也必須強調以健全身體為榜樣的「正常」，而去扭曲或挪用殘障的肉體；敘事所宣稱的形式一致性，其實是被它所無法包含的這些缺異支撐著。紀大偉（2012b）也提及「敘事的輔具」，並結合「情感經濟」的說法，提出「勵志性」做為身心障礙者及其文本的情感輔具，據以討論鄭豐喜、杏林子與幾米的作品；他分析弱勢書寫如何策略性地運用勵志性，與常人社會進行協商或合作，補充了主流常規敘事挪用身心障礙以推進的觀點，主張常人社會在強迫身心健全（ableism）和強迫快樂的雙重機制下，也需要身心障礙敘事做為情感的輔具來支持。

這樣看來，無論是殘障或常人，身心健全主義對於完整圓滿的要求遍及各處；敘事的起點是對於健全整體的錯覺，它所面臨的終點也是這個必須強制執行的完整性。在《紙婚》前半部，同性戀（也被常人社會視為一種缺異的存在）是敘事主要倚賴的輔具，形塑著項這個白人男同志角色，以及其他相關或相對於他的人物。愛滋在此還只是條伏流隱線，隨著情節進展逐步現身，先以發病初期的生理徵狀開始，從拉肚子到血便住院，接著是發高燒；在項被檢驗出感染愛滋後，它便和同性戀連結（前言所引述的「愛滋的同性戀化」，也是常見的社會認知與論述），成為後半部敘事的「義肢」：

項的腸胃病，顯然是因此而起。

據說這病通過行房才傳染，而且只限於男的同性戀人士。八三年出現的病例，定出病名，才引起餘桃人士的注目。

兩年來，已有幾位同性戀死於此病，只是一直不曾引起外界注意。（陳若曦，1986: 183）

在此，愛滋接合同性戀，成為本文所稱的「殘／酷」，凸顯殘障與酷兒交會的歷史與政治，逐漸轉入故事主軸，推動敘事的進展；情節與事件圍繞著殘／酷發生，也帶出角色性格的轉變，捲動更多衝突和起伏。當殘／酷成為義肢，敘事以其比喻美國社會的墮落，⁷ 進行解釋式補償的過程，戮力維持故事對於形式一致性和結構完整性的渴望：⁸ 一方面，敘事不僅記錄愛滋病患的身體變化和苦痛，也細寫同性戀者的歷史系譜和生活型態，像是社群內部對於伴侶制度、宗教信仰與身分政治的爭辯，以及同性戀受騷擾和歧視的情況，甚至仇恨犯罪的情節；敘事掌握了解釋權，也藉此鞏固對殘／酷的需求。

另一方面，敘事除了讓感染愛滋的角色死去，⁹ 另一種必得死的

7 例如敘事以表姐夫的觀點說「同性戀者在他目中並非正常人，而是社會道德墮落的象徵」（陳若曦，1986: 148），即便平平抱持這是可以挽救的心態，後來也認為社會環節出了紕漏，才會滋生這麼多問題，包括同性戀和愛滋病，她解釋這可能是美國高度民主和自由的代價（陳若曦，1986: 246）。

8 Mitchell 和 Snyder（2001: 226-229）認為文學敘事開了解釋式補償的過程，從揭露或標示缺異，到提出對缺異的解釋以穩固敘事對它的需求，再到敘事逐步將此缺異帶至故事核心，最後由敘事的其他部分來處理這個缺異，或修補或治療、或拯救或教化、或替代或消滅。當殘障建構出角色的獨特性缺異，敘事並藉此缺異而啟動和驅動時，敘事很快地遺忘殘障，甚至懲罰它、消滅它。

9 小說記錄死去的愛滋病患者有：頁 280 的美國天王影星洛哈遜、頁 297 的老倪的法律學教授和加州大學師生三人、頁 303 的項在醫院的愛滋病友路易、頁

角色是男同性戀，例如標榜同性戀性自由、教導性安全的大都會教派牧師魯道夫被殺，以及一名黑人男同性戀被吊死，都被懷疑是三K黨所為，而朱連也在項死後開瓦斯自殺；小說裡「不正常的人」若非感染愛滋就是被賜死。而在上述這些個人／身體層面之外，敘事更要在群體／精神、象徵層面上，或拯救、或懲罰消滅這些不合格、不健全、帶有缺異的殘／酷：

（牧師說）美國也很強大，他進而引申，若不及時撲滅同性戀，也有為此亡國的可能。他勸誡教徒，千萬不可犯這個罪；犯罪的，只有痛改前非才有獲赦的一線希望。教會是慈悲寬大的，但鑒於病毒在水中的傳染性，今後將拒絕為愛滋病人舉行浸信洗禮。（陳若曦，1986: 268）

這就是 Mitchell 和 Snyder（2001: 227）所闡釋的「義肢化」：敘事之所以被生產出來，是要去處理或矯正被社會標記為不符常態的缺異狀態。本文進一步認為，文學評論做為敘事的一種類型，同樣會將它所解讀的文學文本裡的殘／酷給「義肢化」。歷來對陳若曦作品的批評可大略區分為三種：女性主義觀點、政治意識傾向和酷兒理論角度；這些不同模式的分析在其批評位置上各擅其長，也把小說裡的殘／酷解讀為敘事的輔具。像是以女性主義觀點評論《紙婚》，強調閱讀陳若曦的小說時，除了文革和海外移民等政治社會面向外，更需聚焦其中的女性角色，關注以女性視角書寫的情愛主題，以及細膩的女性情感傾向。以吳達芸（1988）的評論為例，她特別探討陳若曦小

說所展現的女性自主意識，尤其是《紙婚》裡的平平形象。九〇年代中期之後，女性主義評論才逐漸興盛於台灣學院，後來更深入探討七〇、八〇年代女人主體性展現於女性小說中的文學史脈絡；¹⁰相較於此，吳達芸的評論很早就具有女性主義觀點和關懷，故本文特別關注其看法。

從女性主義觀點出發，吳達芸細膩地分析《紙婚》不像陳若曦以往政治意識強烈的小說，而著重描繪女性形象和能力，進而塑造出一個宛如大地之母的理想女性典型。此形象能夠超越屬於男性意識的政治成見，修補男性闖禍留下的殘局，培養獨立自主的韌性，以愛包容世界（吳達芸，1988: 278）。她特別標舉平平為例，推衍出這個理想的輪廓：

她被輿論譽為「生活的藝術家」——也因而換回了獨立自主的能力，充分省覺到一己的自由。更由於項的病重，激發出她蟄伏的母性，使她走出原先自憐自閉的暗隅，在自我意志的抉擇中，無懼於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愛滋病，陪他至終。（吳達芸，1988: 278）

吳達芸注意到小說裡的男同性戀和愛滋病，認為作者將男性角色設計為同性戀，能夠把男女關係放在純淨的道義情誼上，深入剖析男女兩性的本質，而不像以往作品，男女情愛只是再現小說家的政治文化理念（吳達芸，1988: 278）。若以義肢化觀點來看，這樣的評論模式將同性戀解讀為去性化的角色，沒看見故事中其他的同性戀。愛滋病

10 如范銘如（2002）。

則是平平用以展現「家庭天使、守貞、母性、韌性」(吳達芸, 1988: 277) 氣質形象的裝置, 輔助她走出往昔的創傷與坎坷, 透過自我選擇與獨立成長, 邁向自由寬闊的人生; 平平就像是握著這把「愛滋拐杖」, 走向她的女性自主道路。引文中「生活的藝術家」這個讚頌, 來自報紙採訪平平的報導標題(陳若曦, 1986: 175), 吳達芸用以佐證女性有其潛藏的才華(平平對藝術的高度敏銳, 乃無師自通), 努力轉化挫折困頓就能展現創作技能(進而培育出獨立自主的能力)。然而, 這個美譽出現的時刻, 恰是在項第一次嚴重發病、緊急送醫住院的隔天。女性主義評論讓我們看見女性的自主能動, 開啟重要的認識論視野, 相對也容易看不見做為殘障的愛滋; 在這樣的閱讀徑路裡, 殘/酷做為文學評論的義肢, 成就著女性自主意識。

政治意識模式的評論則偏向從兩岸政治觀點分析陳若曦的作品,¹¹ 讚賞她離開現代主義風格轉向寫實白描的寫作手法,¹² 這種關注政治意識的評論模式, 將小說情節納入兩岸關係和東西文化比較的架構下, 殘/酷完全不是其關懷核心。Liu (2010: 303) 別出心裁將酷兒理論帶入政治意識模式的評論, 拓展出酷兒地理政治學的分析方式。他認為《紙婚》後半部對於愛滋病的描寫, 是以蒼涼荒蕪的疾病意象對比前半部的同性戀寓言形式——此形式浪漫化了戰後美國對亞洲的援助, 而敘事內容將同性戀等同於性濫交與愛滋病, 則反映出 Gayle Rubin (1993: 11, as cited in Liu, 2010: 303) 所說的「性危險的骨牌理論」。在酷兒文學批評類型的分析下, 愛滋和同性戀是一種國

11 如呂正惠(1988)。

12 或如陳芳明(2011: 690-691)稱讚《尹縣長》不能用現代主義或寫實主義概括, 而是血淚般的事實; 以及她使用白描的手法及透明的白話, 非常簡潔卻精確有力。

際政治關係的隱喻。

Liu 進一步認為，愛滋病的情節做為一種敘事策略，被用來調節文化特殊主義和法定形式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愛滋病的設計讓小說（在道德上）比較能被大家接受：讓平平照顧發病的項，以償還用紙婚換綠卡居留的恩情；這個恩施受報角色互換的安排，同時打破後冷戰時期台灣處處仰賴美國援助的單一再現，藉此說明平平所體現的所謂「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如何在尋求「美國」普遍主義的承認時，暴露出二元區分的空無（Liu, 2010: 303）。藉由運用殘／酷做為小說的隱喻，帶有酷兒觀點的評論將小說裡處處可見的中美文化對照複雜化，深刻分析出性的表述（如同性戀）和文化對照之間的相關性：故事前半段使用各種本質性的文化符號建構（玉鐲、豆腐、醬油、家人際），以凝縮成「家庭／親屬／社群」的整體意象來代表中國；但在後半段的敘事轉變裡，這些中國性符碼一一被愛滋病這個酷兒主題給解構了，平平的中國親友們得知項是愛滋病患後開始拒絕和她往來，而且在敘事之上的層次（the extradiegetic level），依中國特質的多寡而逐漸消失（Liu, 2010: 307）。

四、描述性閱讀的殘／酷

前述二節裡，本文也以愛滋做為一支敘事的視鏡，同時探討《紙婚》如何透過殘／酷的隱喻再現婚家想像，以及相關的文學評論模式如何看（不）見殘／酷在敘事的作用。雖然 Mitchell 和 Snyder（2001: 225-226）分析殘障做為敘事的義肢，再現敘事所欲求的、挑戰常規化的、具顛覆潛力的象徵譬喻，但他們也指出，敘事經常忽視殘障本身具有社會或政治面向的經驗，殘障在歷史中缺席，在文化

裡被壓抑，在社會中隱形。Davison (2006: 137) 也提醒，「敘事的義肢」雖然對文學閱讀和評論提出重要警告，但若將這個概念置放到全球化環境裡，就會發現它忽略了殘障和敘事皆有其更大的社會意義；「在某些個案中，義肢仍然就是義肢」。文學文本裡的殘障和敘事都不是超越時空的描繪，而是有其特定歷史情境與社會脈絡的存在；在小說文本的層次，如同本文之前的分析和諸評論的解讀，殘／酷的確是一種隱喻，但在社會世界的層次，殘／酷就不再是隱喻，而是被經驗到的、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生命。

面對這樣的提醒和反思，本文將嘗試運用 Love 所提出「仔細但不深入」(close but not deep) 的「描述性閱讀」——強調記錄與描述而非深度詮釋——進一步思考殘障在文本、歷史、社會和政治上被忽略漠視、或被以人文主義式的人道關懷來處置的情況 (Love, 2010 / 楊雅婷譯, 2012)。Love 關注殘／酷的污名現實及歷史，認為這種結合社會科學的另翼閱讀徑路，既弔詭又辯證地回應文學批評、歷史解釋和倫理問題，因而能夠探問：如何「讓鬼魂繼續當鬼魂」(Love, 2010 / 楊雅婷譯, 2012: 169)、「如何不刻意挽救、修復或遮掩歷史中的失落，而如實面對酷兒污名與社會傷害的歷史暗夜」(劉人鵬, 2012: 17)。她採用 Latour 和 Erving Goffman 這兩位社會學家的研究，借重其經驗觀察和詳細描述的研究工夫，來帶出一種淺層且扁平、淡薄而冷酷的閱讀方法，因而能遠離人文主義詮釋學的批判傳統，也瓦解根植其中的神聖倫理感召 (Love, 2010 / 楊雅婷譯, 2012: 159)。藉由解讀美國黑奴歷史小說 *Beloved* 中被眾多評論分析的去人性化殺嬰場景，她強調敘事呈現出「紀實美學」的技術層面，以缺乏同理心與非見證式的記錄片手法，詳盡記述了這段奴隸制度的歷史失落 (Love, 2010 / 楊雅婷譯, 2012: 162-169)。

Love 進一步研究 Goffman 的污名理論，後者發展的微觀社會分析也以去人性化的觀察和冰冷不溫情的記錄著稱。他從諸多污名個案出發，發展出抽象化和普遍化的原則，將污名視為社會情境而非個人身分。Love (2013: 421) 認為 Goffman 在社會學經典 *Stigma* (1963) 的研究裡，把文本的文學特質視做行為研究的證據與社會互動的詳盡記錄，而不將文學當做純粹的文本世界，文本也不是文學評論所認為的「只有（只是）描述」而已。根據 Love 分析，Goffman 探索文本的方式如同探索具體的社會情境，但是對文學評論來說，要在文本裡找尋真實世界，無疑是天真地忽略文學有其文學性。文學獨特的性質（如虛構或反諷或情節設計等等）使文學有別於其他文類，如檔案文件、個案史或工具手冊等等；可是 Goffman 仍把這些文本都看成檔案記錄來處理，從五花八門的檔案庫裡摘選各種行為場景，剪接成日常活動的連環圖像，再加以分析，而這些材料也包括所謂的嚴肅文學。如果說 Goffman 的理論是將文本片段抽繹歸納成社會科學的分析概念，那麼 Love 則是提議將社會科學概念和技術導回文學分析領域。她特別著重微觀社會學的分析技術——將文學文本延伸到日常生活的行為實踐，關注行動者所處的情境、觀點和行為，而非個人的特質、情感和動機 (Love, 2013: 426-427)。藉此，她倡著重描述行為模式和可見活動的文學分析形式，而不去推測思索那些文本裡看不見的內心狀態與內在意義。

不過，本文無意拋棄詮釋式閱讀的方法，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就是一種詮釋式閱讀。本文認為文學閱讀方法和研究取徑有差異亦有矛盾，不同的閱讀和詮釋取徑表達了文本的複雜多面和（預設的）倫理要求，而 Love 提出「描述性閱讀」，乃嘗試回應當前英美文學研究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亦即後結構主義關於文本再現與形上學等認識

論的逐漸失效，以及新科技對人文學科詮釋學傳統和研究方法的種種影響。她強調若能搭配運用細讀和淺描，可將文學分析帶出死胡同，走出新局面。

本文認為 Love 所提倡的「描述性閱讀」策略，著重行為、觀察、經驗和情境互動，以細讀和淺描做為文學批評的工具，以淡薄和冷酷做為歷史追索的倫理價值，讓我們可以直接面對文學敘事裡的殘／酷再現及其生存狀態，以之抵擋把殘／酷視為義肢而能深入詮釋的誘惑；同時，我們將能重新閱讀原本敘事不容易被看重的部分，看見那些沒有「深度」、不具豐富意義的描述性段落。例如，相較於陳若曦早期偏現代主義小說的「內心」刻畫（如〈最後夜戲〉），和她全然轉向寫實主義後的「動人」情節（如《尹縣長》），《紙婚》的敘事確實顯得相當「淡薄」。《紙婚》的情節架構簡單，筆法冷斂清淡不濫情，即便女主角對於她所不理解的眾殘／酷者經常流露出一不認同與同情，敘述觀點也時而轉入內心情感的描寫，讀者仍難以快速代入女主角的情緒，因為整個敘事聲調和氛圍是相對冷靜淡漠的，甚至帶有相互辯駁的意味。像是平平翻閱項的男同志雜誌，意外發現項投書呼籲男同志要維持單偶制，聲稱多重伴侶關係容易引起嫉妒和疾病。她判斷項是少數派，多數同志主張性的自由與享樂，可是項在她眼中屬激進派，在社群裡又退為保守；項的論點也讓她想起項在六〇年代解放運動的前衛立場，以及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的矛盾（陳若曦，1986: 128-129）。敘事透過短短兩頁的描述，勾勒出當時男同志社群對於婚姻伴侶制度的不同觀點，以及解放運動和同志文化的連結性，包括當時的社群及社會情境。

本文想強調的是，我們能夠藉由「描述性閱讀」，在《紙婚》中回望那個愛滋年代：敘事記錄了愛滋在當時蔓延的諸多歷史狀況，包

括愛滋做為大規模新興疾病，在美國（華人）社會如何被認知、再現、流傳和影響，例如當愛滋污名和歧視尚未出現之前，人們如何和愛滋感染者互動。再如醫藥體制的發展，小說提及美、法兩國在疾病研究和藥物試驗上的競爭，描述 1996 年何大一團隊研究出雞尾酒療法之前，愛滋藥物的研發和使用狀況。¹³ 又如一段描寫朱連開車到墨西哥買愛滋治療藥物的情節，敘事具體且詳實地說明藥劑的種類、療效、副作用和價位，還有當時聯邦藥品局對於新藥試驗和上市的管制程序，如何造成東岸藥品走私的黑市現象，以及美國人遠赴墨國購藥，致使邊境小城蒂瓦娜的藥店門庭若市的前因後果：

由於影星哈遜到巴黎延醫無效，項對法國藥失去信心。朱連買了德國貝爾公司出品的「蘇拉明」，以及美國藥品「阿劑多」。蘇拉明本來是治療非洲昏睡病的藥，能抑制愛滋症病毒中酵素的成長，目前三藩市總醫院正給三十名病人做這藥的臨床試驗。阿劑多有阻止病毒繁殖的作用，對人體毒性較低。（中略）愛滋病是新發現的病，新藥只有三年時間，剛通過的動物試驗，正尋求臨床檢驗，離上市還早，誠「遠水救不了近火」。墨國鄰近美國，又無藥品管制，可以自由販賣，遂形成倒流現象。（陳若曦，1986: 221-222）

蘇拉明和阿劑多在雞尾酒療法問世後已不再使用，強烈副作用也經常讓病人痛不欲生，這段簡述在小說中可說無足輕重，很容易被忽略。

13 小說描寫新聞報導法國人發明「塞克羅史保靈」，宣稱可控制病毒，但美國醫生表示存疑（陳若曦，1986: 307-308）。後來發現事實不然，治療的希望成為泡影（陳若曦，1986: 329）。

然而回顧這段愛滋歷史，並置台灣愛滋感染者現下的處境來看：在後雞尾酒療法的此刻，台灣有些感染者基於種種原因不願或不能進入政府追蹤列管制度，因此拿不到免費愛滋藥物，也需要託人到泰國私下代購較便宜的學名藥，偷渡回台灣。這樣的遭遇聽來彷彿是朱連為項所做的走私情節在不同時空脈絡下重新搬演。

八〇年代跨國企業壟斷愛滋藥物，加上美國政府對於藥物人體試驗及上市的相關規定，使當時許多愛滋感染者和親友為求一線生機，想方設法越境購藥，也發展出迥異於官方醫藥體系的自主醫療和社群照護（如電影 *Dallas Buyers Club* (2013) 的再現），之後他們集結力量，向美國政府施壓，改變了藥物上市的相關規定。本文透過「描述性閱讀」來標誌此歷史時刻，同時對照廿一世紀台灣愛滋感染者和親友亦需跨國購藥的情況，想指出：一方面，在全球愛滋醫藥企業和愛滋服務產業的茁壯過程中，愛滋藥物的專利化和高額利潤讓跨國藥廠更容易形成壟斷，也影響第三世界國家對於學名藥的談判。目前在台灣，感染者必須進入政府列管系統才有免費藥物，即便有錢也不可能買到藥，加以專利藥昂貴，台灣政府在學名藥談判上又無甚進展，迫使某些人得到泰國「偷渡」較便宜的學名藥，例如沒有公民身分的外籍感染者（像是移工或外配）——他們依法可能必須離開台灣，因而不能被政府列管——以及因種種因素不願受體系監控的公民感染者。

另一方面，美國當年因為醫療尚待發展及愛滋政策不完善，致使跨國買藥成為存活自救的少數辦法之一；反觀現今台灣的體制相當「完善」，感染者只要接受政府列管，即可免費取得抗愛滋病毒藥物，大大降低病毒對生命的威脅。但諷刺的是，「偷渡」藥物迄今仍是某些人為了生存而必須採用的地下策略。面對台灣政府現行的愛滋列管政策，部分愛滋感染者自願或無奈地進入國家提供的醫療照護體

系，接受免費治療而得以維持生命；由於多數學名藥遲未引進，專利藥價格昂貴，一般人難以負擔，感染者不得不仰賴目前的列管制度。然而，就如《紙婚》情節所描述的景況，目前也有部分感染者身處政府的列管系統之外，透過自力救濟和社群網絡協力找出存活之道。這種同時由個人與社群自我培力而成的草根行動模式，是八〇年代美國愛滋行動的特色，也是後來全球愛滋運動在地發展的重要基礎；此處的對照分析，想凸顯的便是草根行動模式面對結構性阻撓的歷史性及政治性。¹⁴

《紙婚》的日記體敘事不像一支人文主義內視鏡，反倒更像一座新聞編輯台，匯集報紙電視新聞、人際耳語八卦、人類學田野訪調，如錄音筆攝影機般地去記錄、描述和呈現，正反觀點並陳，既不避諱敘事者的「保守」觀點，也不掩飾各角色前後「矛盾」的立場，尤其是爭議性特高的六〇年代解放運動、同性戀和愛滋，敘事者都詳加說明，例如關於同性戀（教派、路線）與愛滋抗議活動的記述。敘事不僅具體細膩地描述事件狀態，也呈現不同觀點，像是對比不同愛滋感染者的立場變化，以及宛如定格分鏡般地細寫愛滋感染者發病的身體狀態：

項的氣管炎真的轉成肺炎，呼吸有些困難。剛卸去點滴瓶子，手腕落下大塊瘀紫，皮膚像片皺紋紙，青筋畢露如爬行的蚯蚓。鼻孔插上了通氧氣的橡皮管，據說不影響說話，但病人顯得呼吸急促，也自動壓抑談興。（陳若曦，1986: 294）

14 此段關於「偷渡」愛滋藥物和台灣列管政策的論點，感謝陳奕村和喀飛的討論與回應。

早上剛拔下橡皮管子，不料下午出現內出血。這次很嚴重，眼睛深陷成黑洞，臉色蒼白地躺在床上，手腕又套上了點滴管子。（中略）我們聽路易的情況，據說剛被移到三樓的加護病房，正昏迷不醒中。他的房間沒動，渡過危險期後，他會再回來養病。項習慣了和他做伴，一時分手，不免悵然若失。（陳若曦，1986: 299）

Cindy Patton 在批判現今全球愛滋防疫政策「治療即預防」所運用的權利觀念時，提出區分「見證罹病」（witnessing illness）和「見證疾病」（witnessing disease）的重要性。她回探美國愛滋運動的歷史，追溯這兩種見證位置在愛滋防治過程的興起。前者奠基於 1980 年代初期同志解放運動和同志權利運動對於危機的回應，其所促生的第一波愛滋運動讓愛滋感染者得以持續現身，強調生存與死亡的尊嚴，而能夠「把焦點放在個人的生病過程上，關注她每天的勝利與反挫，關注她從一開始的急性疾病到變成慢性疾病之間的轉變以及進入末期之後的實際狀況」（Patton, 2011 / 林家瑄譯，2012: 166），在見證罹病的同時，也見證著種種錯誤冤屈及污名侮辱。後者則站在流行病學和人口健康的公衛防疫位置，以風險統計、削減病毒和計算成本來宣稱政策的優越性。Patton 藉由歷史分析提醒我們，後者如何使感染者逐步失去訴說自身罹病和冤屈的發言權和能力，「就好像那些與愛滋共存者的親身參與——見證罹病——從未發生過」（Patton, 2011 / 林家瑄譯，2012: 148）。

在上述的小說引文裡，敘事如攝影鏡頭般仔細觀察，詳盡描述了愛滋感染者發病的身體細節。在 Patton 批評當前愛滋政策的脈絡裡，本文一方面贊同將《紙婚》讀為具有「見證罹病」之敘事特點和歷史

效應的文本——它記錄了人們如何體／認愛滋的歷史時刻，也見證了感染者所承受的身體苦痛和冤屈污名；當我們批判過往和現下罔顧感染者生命經驗的政策體制時，這樣的見證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本文藉由「描述性閱讀」來討論文本裡的愛滋議題，以標明《紙婚》著重淺描的敘事特點，嘗試提出不同的閱讀位置和倫理觀，強調以描述和記錄來對比見證和控訴，前者將能阻止我們太快用同理心和悲情（甚或濫情）去詮釋「歷史見證／見證歷史」，進而使我們能有空間思考：如何掙扎擺盪於愛滋病患、親友照顧者、運動者與歧視者等的位置？如何去看見承載了疾病折磨與苦痛的身體？這個病／身體在什麼情境和體制中承載了冤屈和污名？做為社會災難或歷史浩劫的「愛滋」，如何同時是結果也是原因，轉變著這些人、事、物？本文認為採用「描述性閱讀」讓我們注意到《紙婚》所描述的場景和情境、過程和效應，小說記錄愛滋歷史的失落／死亡，而不是在拯救或修復它，這同時也使我們必須再度回到歷史中，赤手空拳地觸摸這些背負污名與羞恥的冤魂野鬼，並且殘酷無情地體認到，它們其實再也無法復活。

五、小結

Christopher Castiglia 和 Christopher Reed (2012) 以記憶為理論概念，討論愛滋與酷兒的過去對於當前酷兒政治的重要性。藉由追溯美國男同性戀先鋒在 1970 年代前愛滋時期所開闢的生存策略與空間——它們現已逐漸消失，而且正被人們遺忘、或人們不願記起——Castiglia 和 Reed 試圖創造一個集體連結，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與愛滋息息相關的酷兒過去，具有讓我們能夠改變現況、想像新未來的潛

力。他們分析，愛滋浩劫造成的創傷與哀慟如此巨大，致使世代記憶斷裂——當代的同志文化和政治不願回看充滿失落的過去，只想迎向幸福美滿的未來。但 Castiglia 和 Reed 強調同志酷兒需要回望、需要向後看，因為記憶是一種抵抗的行動，它飽含可能性，不只有失落，也有爽快和熱望。

本文也認為台灣當代的同志社群及文化需要回望愛滋時代，而《紙婚》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小說中展現的寫實與紀實手法，「讓愛滋仍就是愛滋，讓同性戀仍就是同性戀」，讓這段愛滋襲捲美國同性戀社群和社會的重要歷史，得以透過小說的技藝和文學的手法被記錄與再現。透過擱置深入詮釋的閱讀，使那個倒退的過去和失落的世界不會因此消失在視野裡；藉由既貼近但又表面的閱讀策略，我們看見了殘／酷政治的歷史與現在。這樣的閱讀讓我們不去粉飾太平，也就不再將愛滋解讀為用以展示女性拯救男性、再現女人的母性特質、突顯現代女性意識的情節設計；也不只是傳達「台一中一美」國際關係的政治意識表徵；更不再是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墮落的象徵，或東方女性藉由照顧愛滋病患得以償還西方恩情的文化隱喻。

「讓愛滋就是愛滋」，就如 Susan Sontag 所呼籲的，要拋棄隱喻加諸疾病的無意識使用，看見 1981 年愛滋出現後，體現於全球男同性戀身體的殘酷，看見 1984 年愛滋開始在台灣社會引起的性污名和疾病恐懼，記起那些在災難中死去的夥伴、在體制內受苦的朋友，同時回望關於疾病、殘障、污名、歧視、死亡、失落的歷史。

參考文獻

- 卡維波 (2011) 〈逆流酷兒〉,《文化研究》, 13: 324-337。
- 朱偉誠 (2005) 〈另類經典——台灣同志文學 (小說) 史論〉, 朱偉誠編《台灣同志小說選》, 9-35。台北: 二魚。
- 行政院衛生署防疫處 (1990) 〈台灣的愛滋病現況〉,《疫情報導》, 6(2): 9-16。
-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12)《傳染病統計暨監視年報 -100 年》。台北: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 吳達芸 (1988) 〈自主與成全——論陳若曦小說中的女性意識〉, 陳萬益編《陳若曦集》, 257-280。台北: 前衛出版社。
- 呂正惠 (1988) 〈徬徨回歸線——陳若曦小說中的政治三角關係〉,《文星》, 166: 88-94。
- 汪其楣 (2010/1995)《海洋心情: 為珍重生命而寫的 AIDS 文學備忘錄》。台北: 遠流。
- 林宋瑜 (2000) 〈永恆的定義——《遠見》《二胡》《紙婚》中的情愛主題〉,《華文文學》, 4: 50-56。
- 紀大偉 (2012a)《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台南: 台灣文學館。
- 紀大偉 (2012b) 〈情感的輔具: 弱勢, 勵志, 身心障礙敘事〉,《文化研究》, 15: 46-74。
- 范銘如 (2002)《眾裡尋她: 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 麥田。
- 張平宜 (1995)《握個手, 好嗎? 國內第一本愛滋病新聞報導文學》。台北: 性林文化。
- 陳芳明 (2011)《台灣新文學史 (下)》。台北: 聯經。
- 陳若曦 (1986)《紙婚》。台北: 自立晚報。

- 黃道明 (2012) 《酷兒政治與台灣現代「性」》。台北：遠流。
- 廖娟秀 (2000/1995) 《愛之生死：韓森的愛滋歲月》。台北：大村文化。
- 劉人鵬 (2012) 〈打造一個夠落後的烏托邦：海澀愛的污名連線政治與罔兩問景〉，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9-21。新北市：蜃樓。
- 劉人鵬編 (2011) 〈污名的比較：殘障與性〉 專題論壇，《文化研究》，13: 264-337。
- Castiglia, C. and Reed, C. (2012) *If memory serves: Gay men, AIDS, and the promise of the queer p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avidson, M. (2006) Universal design: The work of disabili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L. J. Davis (Ed.),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3rd ed. (pp. 133-146). NY: Routledge.
-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P. (2007) Queer Marxism in Taiwa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8(4): 517-539. doi: 10.1080/14649370701567971
- Liu, P. (2010) Why does queer theory need China? *Positions*, 18(2): 291-320. doi: 10.1215/10679847-2010-002
- Love, H. (2010) Close but not deep: Literary ethics and the descriptive turn. *New Literary History*, 41(2): 371-391. doi: 10.1353/nlh.2010.0007 楊雅婷譯
- (2012) 〈仔細但不深入：文學倫理與描述轉向〉，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141-171。新北市：蜃樓。
- Love, H. (2013) Close reading and thin description. *Public Culture*, 25(3): 401-434. doi: 10.1215/08992363-2144688

- McRuer, R. (2006) Introduction: 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and queer/disabled existence. In *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pp.1-32). NY: NYUP.
- Mitchell, D. and Snyder, S. (2001) Narrative prosthesi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metaphor. In L. J. Davis (Ed.),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4th ed. (pp. 222-235). NY: Routledge.
- Patton, C. (2011) Rights language and HIV treatment: Universal care or population control?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41(3): 250-266. doi: 10.1080/02773945.2011.575328 林家瑄譯 (2012) 〈權利語言與 HIV 治療：普世關懷還是人口控制？〉，黃道明編《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145-169。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Rubin, G. (1993)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H. Abelove, M. A. Barale, and D. M. Halperin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pp. 3-44). NY: Routledge.

AIDS, Gay Men, and Aspirations to Marriage: The Politics of the Disabled and the Queer in Chen Ruoxi's *Paper Marriage*

Meng-Che Tsa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en Ruoxi's *Paper Marriage* written in 1986. By viewing the various impacts brought by the AIDS epidemic that are depicted in this work of fiction, it also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ialectical interplay between the epitomized “happy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misfortune of disease” represented in this novel. After inquiring how AIDS and homosexuality have influenced the narrati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aper Marriage* shows the politics of disability/queerness in order to question the politics of gay happiness which is usually depicted as based on desire for marriage and family. Through a lens of “descriptive reading” in analyzing this novel, this paper takes *Paper Marriage* as an expression of “documentary aesthetics,” and it focuses on its narrative of how American society viewed the historical events surrounding homosexuality and AIDS that are represented and recorded in the art of novels and form of literature. It enables “AIDS remains AIDS and homosexuality remains homosexuality.” To visualize the embodied politics of disability/queernes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male homosexuality—since the first case of AIDS was reported in 1981—is to look backwards at the history of

disease, disability, stigma, discrimination, death and loss.

Key words: AIDS, homosexuality, disability, queer, *Paper Marriage*, descriptive reading

◎作者簡介

蔡孟哲，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聯絡方式〉

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

Email: wyvernray@gmail.com